

# 媒介与社区赋权：语境、路径和挑战

王斌 刘伟

##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民众利益表达与基层社会管理之间由于缺乏多元协商机制而陷入刚性博弈。随着社区生活的发展成熟，社区居民自我赋权的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媒介既是凝聚社区民意、增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也在维护权益、争取资源的同时实现了在地发声和传播民主化，满足了社区赋权“主体性”、“在地化”和“实效性”的要求。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成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连结，成为社区赋权的有力途径。媒介与社区赋权的路径主要集中在文化认同和集体抗争两个纬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模式。植根于中国语境的媒介社区赋权在研究与实践中均强调赋权中“他助”，但从赋权的本质出发还需培育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探寻公民、媒介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可持续互动关系。

## 关键词

媒介、社区赋权、认同、抗争、主体性

## 作者简介

王斌，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电邮：binwang@ruc.edu.cn。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电邮：1642239388@qq.com。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语境下新媒体与基层社会抗争的理论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YJAZH067）的资助成果。

## Study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China's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ntext, Approaches and Challenge

WANG Bin LIU Wei

##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edia, the interplay of online discussion and offline action is becoming a frequently happened phenomenon in China which fosters citizens'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to interpret media performance in community empowerment. One is to cultivate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Another is to mobilize

collective contest. Community media functions differently in the two dimensions. Roote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media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usually emphasis on "the Other-Help". However, the future researches need to shed light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so as to explore the power and 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citizens, media and society.

### Keywords

media, community empowerment, identity, contest, subjectivity

### Author

Wang B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binwang@ruc.edu.cn.

Liu Wei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1642239388@qq.com.

This paper is a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Theoretical Study of New Media and Social Conten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15YJAZH067),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Planning Fund for the Resear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近年来,基层社会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厦门PX事件”、“广东江门反核事件”等社会冲突与抗争折射出基层居民争取更多社会参与和自我管理的诉求。民众利益表达与基层社会管理之间由于缺乏多元协商机制而陷入刚性博弈。随着我国社区生活的发展成熟,社区居民自我赋权的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基层社区的管理变得愈加复杂和重要,以社区利益为基础的抗争事件呼唤着社会治理的创新。

伴随着新媒体在基层民众沟通中的广泛应用,从在线协商到线下行动的动员过程越来越迅捷,线上线下力量的交互转换进入常态化,原有以“堵”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正逐渐被淘汰,基层管理面临着从“疏导”到“善治”的革新。基层社会的沟通、协商与抗争有何新的路径与机制?媒介在社区居民争取权力的进程中有何新的作用和角色?弱势社区如何通过媒介赋权谋求生存与发展出路?这些成为社会转型期传播领域亟需关注的问题。以往对媒介赋权的研究较多围绕某一类型弱势社会群体的赋权个案进行讨论,本文从社区层面集中考察媒介传播与群体赋权,尝试提供中观视角的理论分析。

## 一、媒介与赋权的社区视角

赋权(Empowerment)又称增权,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用语,较早

出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后来延伸至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学术领域,是一个多层次、宽泛的概念体系。“赋权”最早被视为一种人际传播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于小群体内众多个体间的相互交往”(陈楚洁,2010)。从社区的角度来看,赋权是“通过社区参与让缺乏资源平等分享的人们实现对资源的接近和控制”(Rappaport, 1995)。赋权是指增强人、人际或集体的政治力量,使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的过程(Boehm & Boehm, 2003),这个定义强调从个人到团体的主动采取行动,而赋权的目的是改变公共生活现状。

因此,赋权存在个体、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划分。个人层面的赋权注重个人效能感(Self-efficiency)和个体控制能力的提高,以增强个体达到目标的动机;社区层面的赋权强调将分散的社区群众组织起来实现改进社区生活的目标,而社会层面的赋权旨在改变社会规范、公共话语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而在赋权的任一层面中,都涉及三个天然取向,即赋权的对象是社会的“无权”群体,赋权的过程与最基本的传播行为联系,赋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丁未,2009)。因此赋权理论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国外的社区工作中。

我们可以认为,社区层面的赋权是指一定地理区域内,由拥有共同社会生活和共同意识的一定数量的居民争取共同权力,改善社区福祉的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一些社区在社会运行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被动参与社会生活,难以为自身发展谋求合法权益,更难以对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影响,造成“能力缺乏—陷入弱势—限制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弱势社区需要通过内外部的信息传播和沟通协商增强自我认同,吸引社会资源,激发发展潜能,从而实现社会变革。

所谓赋权并不是由上而下的“赋予”,而是激发和挖掘案主的潜能。学者古铁雷斯(Gutiérrez, L.M.)、帕森斯(Parsons, R.J.)和考克斯(Cox, E.O.)建立了一套社会工作中的赋权模型:社区业主和社会工作者在共同的价值和理论上形成彼此认可的关系,然后通过社会问题解决取向的组织实践进行赋权(转引自陈树强, 2003)。在这个意义上,社区赋权中业主和社会工作者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传统的“专家”变成“倡导者”。社区赋权则被界定为“分享权力”和“一道拥有权力”的过程。

社会工作中弱势群体增权有两种模式:“个体主动”和“外力推动”。由于西方社会长期盛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并形成了成熟的市民社会组织,内外两种模式得以交织使用。但在中国语境下,受到制度、政策等环境制约,弱势群体很难依靠自

身力量主动赋权,只能通过“他助”推动实现“自助”,出现了中国弱势社群的“增权困境”(范斌,2004)。

社区赋权的研究逐渐转入传播学领域与发展传播学的转向有密切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赋权”和“多样性”为核心的“参与式发展”成为发展传播学的突出研究取向。参与式行动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关注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窘迫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试图制定明确的、本地化的、为当地人群赋权的社会行动,使之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权力(王锡苓,孙莉,祖昊,2012)。

最早的传播学社区赋权研究可以追溯到1967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在纽芬兰地区试验的Fogo项目(谢进川,2008)。该项目通过拍摄互动电影的方式让Fogo岛上的居民讨论生存、就业等发展问题,引发政府部门的关注,促进了有利决策的实行,成为参与式传播为弱势社区谋求出路的成功案例。此后,“媒介近用权”、“媒介内容的决策、生产和传播”、“自我管理 with 集体决策”成为发展传播学的重要议题,也因此丰富了社区赋权的方法,即通过对话、讨论、训练与组织化培养等方式,增强弱势社区的生产能力和居民自我效能。

社区赋权逐渐指向通过参与式传播聚合社区居民的路径:通过讨论和协商催生其改变环境限制、谋求自身发展的意识、策略和集体行动。但如何让社区居民真正运用新媒体进行信息生产,并且建立长效的传播机制是赋权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社区赋权具有“主体性”、“在地化”和“实效性”三个特征。社区赋权的“主体性”要求社区居民作为赋权实践的主力军,通过广泛的参与和自主的媒介使用实现文化传承、资源动员和政治权力的增益;社区赋权的“在地化”要求媒介赋权与社区的本地语言、文化,以及特有的传播工具和方式相结合;社区赋权的“实效性”则要求居民通过媒介发声,进行群体性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公共利益,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利好影响。

从我国的传播实践看,学者王锡苓等(2012)根据参与式行动研究,强调了社区赋权过程中人的自我发展的主动性,认为赋权是社区成员与外部专业人员之间均衡的知识分享,而非自上而下的传播或传授,并提出社区赋权的传播模式具有互动、多样、去中心化、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孙信茹等(2012)强调地方性,提出运用本土传播工具来制作和形成社区内部的信息传播网络,认为媒介社区赋权应遵循“有序”、“有效”和“有用”的原则,通过培养社区公众的信息生产和媒介使用能力,增强边缘群体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

## 二、传播资源近用：媒介与社区赋权的现实语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范围扩大、速度加快,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社会关系和聚居形态也随之变迁,由此产生不同类型和功能的新社区。社区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和社区的整体营建关系着每一户居民的日常生活。

在地区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利益分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社区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对社会资源占有较少、自身发展受到制约、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话语权和社会能见度较低的社区就成为弱势社区,一般多存在于经济发展落后或社会矛盾尖锐的地区,呈现居民规模小、组织结构松散、社会网络单薄、与外界交往有限等特征。弱势社区的发展关系着社会的平衡和稳定,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潜力。如何将弱势社区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是社区赋权的重要议题。

媒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对社群来讲不仅意味着自主发声的管道、与各方力量沟通的话语权、有能见度的舆论呈现,也影响着群体形象的建构。因此,弱势社区的自我增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媒介资源和媒介近用权的掌握。社区媒介作为居民参与式传播的平台,通过连结性行动发挥着重塑社区、培育公民意识、维权抗争的作用,是社区自治和社区居民自我赋权的重要途径(王斌,古俊生,2014)。

媒介对社区赋权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通过媒介的信息传播和舆论营造,引发外界对社区的关注和帮助,促进社区矛盾的解决,稳定社会秩序;其次,社区自身通过媒介进行在地发声,实现话语权的争夺和传播的民主化,构建良好的社区形象,赢得更多资源和发展机遇;再次,社区媒介作为聚合民意和行动的平台,强化居民的归属感和情感联系,催生社区公共意识、实现线上线下动员,是传承本地文化、增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需要看到,媒介的社区赋权依托于开放的媒介环境和较高的公民媒介素养。在中国媒介管理体制的现实约束下,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报纸难以突破既定的政治议题和商业模式,在社区赋权方面作为空间有限。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开放、平等、互动、协作、共享”的新媒体促进了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并由此带来社会传播关系和地位的转变,为社区赋权开拓了新的思维和渠道。

新媒体赋权不仅是一种技术赋权,更是一种传播赋权。新媒体在提供表达空间,推动社区文化传播,整合多方资源,形成社区利益联结,催生社区集体行动上发挥着比传统媒体更显著的作用。随着新媒体发展产生的网络虚拟社区,包括小区

论坛和业主自发形成的QQ群、微信群等，更是将线上交流的弱关系与线下社区生活中的强关系连结。社区群体通过新媒体争取权利，改善生存状况，积累社会资本，提升社会地位。新媒体成为社区自治、动员、维权和抗争的重要平台，也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媒介。

有学者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新媒体给社区赋权带来的新机遇，认为新媒体增进了传播民主化、社区行动力和社区主体性，让社区居民拥有自我表达的话语权，并承担起向内培养社区意识和社区文化，向外提起利益诉求和集体行动的赋权任务（宋晖，2014）。还有学者强调了新媒体环境下社区赋权的主体性和连结性，提出融合性社区媒介一方面通过培育公民意识促进了社区居民的自我赋权；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的动员达成连结性行动，成为超越地域性的公民抗争行动的重要组织平台（王斌，古俊生，2014）。新媒体的赋权作用还需置入特定的发展环境中进行检视。有研究对未通互联网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新媒体赋权实验后发现，当外部推力离开后，社区居民使用新媒体的“自助”意识和参与能力明显下降，又一次印证了“增权困境”。新媒体赋权效果微弱的原因被归结为“外部赋权”不足，如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性、社区赋权的宣传力度不强等（李刚存，肖婷，2013）。

### 三、认同与抗争：媒介与社区赋权的阐释路径

媒介与社区赋权的理论分析可以从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心理层面的媒介赋权主要在于社区居民自我效能感和增权意识的建立：通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信息传播和社会互动中，增强社区内部的自我认同和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争夺社会资源、改变现状的勇气和自信。因此，心理层面的赋权议题主要表现为社区文化的传播、自我认同感的增强，以及在此基础上促成的集体协商。第二，行为层面的媒介赋权主要在于居民自主利用媒介争取权力的能力培养：借助新媒体非凡的传播力量将社区集体决策和行动付诸实践，为社区赢得广泛的舆论支持，使弱势社区的诉求避免沦为“沉默的螺旋”，推动社区抗争行为的良性发展。行为层面的赋权议题主要表现为社区争取权力，维护权益的抗争运动。社区居民借助媒体形成抗争目标，制定抗争策略，集聚抗争力量，从而与强势权力团体进行博弈与抗衡，实现自主赋权。

#### （一）媒介赋权中的社区文化 with 自我认同

社区文化的意涵非常广泛，既包括当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思



维方式,也包括日常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社区传统文化的衰落让居民陷入身份认同缺失的普遍焦虑。然而社区媒介的信息传播生产出集体记忆和共同意识,社区文化被重复、共享和认可,社区居民因此获得自我肯定与满足的效能感。在这种社区认同的基础上,居民更容易聚合在一起商讨社区发展的问题,找寻制约发展的原因并探索突破困境的出路。社区居民通过集体协商和统一行动维护共同利益的经验也会增进和谐的邻里关系,强化身份和情感的认同,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达到良性循环,即社区文化的媒介赋权模式(见图1)。



图1 社会文化的媒介赋权作用模式

社区文化取向的媒介赋权研究通常采用民族志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实践性和行动性著称。学者卜卫常年在传播赋权领域进行“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研究对象包括农民工聚居区、少数民族地区、被拐妇女、农村儿童和青年爱滋病感染者等社区和群体,主张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了解社区居民的真正利益诉求,寻找适合的传播赋权方式。这与上述“参与式发展”和“参与式传播”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近年来,她参与发起“视觉社运项目”,利用视觉的可见性作为抗争的工具。北京皮村的外来打工人口通过社区组织“北京工友之家”建立打工青年的博物馆、小剧场、电影院、文艺演出队等,业余时间义务演出,拍摄自己的纪录片、电影,编演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并且透过这些传播载体使“边缘社群以主体的身份作自我叙述,从而打破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马杰伟,周佩霞,2009),由此获得自我赋权。

视觉传播在现实再现、情感召唤和行动卷入上都有较好的实践作用,因而被广泛采用。

云南少数民族社区的参与式影像实践促使社区居民围绕社区事务有关的主题,参与到讨论、拍摄、制作、放映、推广以及效果评估的各个环节中,并通过影像记录这种集体反思、商讨和决策的过程(韩鸿,2011)。剑南地区的“社区媒体行动计划”探索媒介公共服务在灾后青少年抗逆力建设中的视觉赋权作用(吴炜华,程

素琴, 2010), 也讨论了媒介在社区文化和心理认同中的赋权作用。这类参与式传播建构了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媒介空间, 以此传播本社区的声音, 推动居民共同解决社区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争取更好的发展机遇。

这些传播实践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云南、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地区, 围绕农业、文化、教育、扶贫和社区建设等主题开展。对弱势社区文化赋权的关注和倡导具有很强社会责任感。但是, 这类取向的社区赋权大多为环保、文化等相对偏“软”的议题, 没有触及社区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此外, 研究视角多放在个体心理层面的赋权, 而赋权的三个层次是相互影响的, 社区个体与社区组织存在相互赋权的过程, 社区组织赋权又与更大的社会赋权相呼应,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考虑。

## (二) 媒介赋权中的社区权力与集体抗争

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 各种矛盾在基层社区凸显, 自发的社区动员、邻避运动、群体性事件频发。当政府或商业利益侵犯了社区的自身权益, 双方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而造成矛盾激化、关系破裂时, 社区居民往往会寻求抗争路径。这些抗争事件以满足居民共同需求, 保障共同利益为目标, 通过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形成集体性行动, 往往自动绕开了国家行政管理系统。

社区维权和抗争的议题因为受到地域性限制, 很难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居民开始选择通过社区媒介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抗争行动。新媒体以低成本的信息传播实现更加便捷的民意聚合, 在社区权力抗争中发挥线上的话语联结和线下的行动组织的作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动员机制与传统的社会运动动员机制相比更加高效, 不需要现实组织的集合就能迅捷地形成目标统一的抗争群体, 节约了动员和集体行动的时间及成本, 为社区抗争和传播赋权提供了新的路径。



图2 社区抗争的媒介赋权作用模式

在具体的赋权机制上, 表现为社区、媒介和政府三方的相互作用(见图2)。



社区抗争群体一方面通过微博、论坛等新媒体上的联系和讨论凝聚成身份认同,明确出有针对性的抗争对象和目标,形成统一的抗争口号、标语等诉求表达,进行自主的议程设置;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媒介的动员聚合出现实空间的抗争队伍,将零散的、互不认识的居民个体召集起来,自发组织游行等统一的抗争行动。“厦门PX事件”等群体性事件都表现为线上话语与线下行动的双向互动。社区居民不是被动地“卷入”,而是主动地“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的媒介素养和媒介行动也开始提升,他们积极利用各类媒体,特别是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向社区居民解释缘由,表达态度,公布解决方案,以此来缓减抗争群体的紧张情绪,促进抗争事件的平稳解决;同时也对媒体的报道和传播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社区自我抗争的目的是表达意见,争取权力,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对基层社区的管理不能仅停留在浅层的民意收集和形式化的舆论引导上,应“遵从新媒体传播规律、尊重网民作为信息受众和信息主体的双重身份”(潘晓慧,2013),及时正视社区的问题和矛盾,以积极沟通、公开透明的态度帮助社区寻找解决办法,充分发挥社区的自主性,消解抗争行动的不良影响,并借此机会提高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执政能力和管理能力。

媒体的角色成为社区抗争事件的核心节点。在双方力量的交错中,社区媒介除了保障基本的信息传播,还担当着动员、联系与协调的角色,在促成有效沟通的基础上推进对话与协商。“网络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它开启了电子协商的时代,并重新建构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来建立彼此的信任和找到问题的合理解决路径”(张加春,2012)。媒介并非仅仅是双方意见协商的“公共空间”,有时也担当弱势群体的抗争指导者,引导社区赋权运动的诉求方向。各类媒体的报道通过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影响着抗争事件的发展进程和对抗双方的力量博弈。

在社区媒体本身的建设还不够充分时,公民新闻和公民媒体实际上扮演了组织和动员的角色。台湾的经验表明,公民新闻平台的平等参与和分享互动“让社区行动被外界关注和肯定,并促进在地商机引进社会资源,取得在地文化诠释权,进而促进社区变革”(孙曼萍,2009)。相比台湾的社区公共空间,大陆的公民新闻现象其实是一种“公民媒体缺席的公民传播,根源是缺乏制度化的公民媒体空间和公民习性”(陈楚洁,2010)。未来公民新闻的发展不仅要靠公民媒介的发展,还要以公民社会的崛起、公民意识的普及和公民素养的提高为基础(刘素宏,丁艺,

2013)。事实上,媒介在社区赋权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不应是策动具体抗争事件,而应该强调“理性赋权”。培育公民意识和媒介素养,提高社区居民的自主决策和社会参与能力,引导社区理性争取权力才是媒体赋权的出发点。

#### 四、培育主体性:媒介与社区赋权的未来挑战

当前对于媒介与社区赋权的理论与实践探究强调赋权中“他助”的重要性,由外部的“赋”来实现内部的“增”,这与中国环境下开展赋权的现实条件较为吻合,但要推进真正符合原意的社区居民赋权,还需深耕才能发挥赋权主体性的路径。

他者赋权是通过外部力量提供信息和舆论支持,提升社区赋权的信心并带来外界社会的资源扶持。自我赋权是通过自身的媒介接触使用以及与外界的互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获取社会资源,提升社会地位,获得自我效能感。在媒介社区赋权的实践中往往遇到他助与自助的平衡问题。在现有的社区赋权实践和研究中,多由文化精英、媒体精英和NGO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推动,外来者的主观意志往往强加在社区赋权过程中。在赋权方式上以理念和方法的灌输为主,加重对赋权过程的控制;在传播过程中以单向传播为主,弱化了社区公众的主体性。经由外力推动形成的媒介赋权在外力撤去之后并不能达到持久的效果,因而缺乏自主意识和自助能力成为赋权研究的主要困境。

自上而下的外部赋权注重社会制度、政策对社区发展的支持和保护。这种赋权模式引入了强大的外部支援,营造出有利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消除社区赋权的外部障碍,因而可以在短时间内激活社区的赋权意识并催生出有影响力的赋权行为。但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没有培育出原生态的赋权模式和自组织力量,现有的赋权成果很难实现复制和创新发展,社区赋权的持续性不强。此外,外部赋权由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运行情境,也存在着冲击和破坏社区原有传播和民主秩序的可能。

自下而上的内部赋权强调社区民众的自我需求和权益表达,把社区居民看作完全自主的赋权主体。这种模式具有理想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完善、居民政治参与的理性以及赋权意识的强烈程度。在国内社区管理还不尽完善的现实下,居民缺乏主体性和主动性,很难产生完全自主的内部赋权。

赋权的主体性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需要增强群体的自我认知和协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对群体利益诉求的过度强化导致与外界社会割裂,乃至被媒体污名化、边缘化。当前的研究大多对新媒体增强社区赋权的主动性寄予很高期望,认为在很

多群体性事件中,社区群众可以借由新媒体的力量实现表达、抗争的自我赋权。但对于社区赋权来说,媒介发挥的不可能总是增权作用,也有可能复杂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加深弱势社区与外界的鸿沟。媒介的赋权效果受到宏观的社会环境、中观的媒介使用和信息生产传播方式以及微观的居民个体心理效能感的影响,因而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媒介是否存在减权效果,而这种减权是在怎样的作用机制下产生的,会对社区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社区又将如何抵御媒介的减权作用?媒介的实际赋权效果有待于更多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检视。

因而,我们认为,媒介赋权还应回到社会互动这一原始内涵上来。在不同的社区环境中,媒介赋权所面临的资源、阻碍以及各方力量的拉扯关系都不尽相同,应强调社区与外界的沟通、对话与联动。媒介社区赋权实际上是通过社区居民与外界环境丝丝相扣的互动和联结而产生的一种双向社会交往。在这个社会交往过程中,借由信息传播和资源动员达到权力关系与社会地位的重塑,社区居民逐渐培养起自主赋权的技能,实现持续赋权的效果。社区成员发挥主体作用,进行能动性的参与、实践和探索,外部力量起到推动和协助的作用。“他助”和“自助”的结合不仅可以引发外界更广泛的关注,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还可以有效改善社区的生存状况和外界形象,同时也对周边环境发挥影响力。

赋权的双向社会互动模式强调社区自身的主体作用,也重视对弱势社区的外部辅助。一方面需要外部力量提供有利的政策扶持和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亟需借鉴国外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路径。例如可以通过社会工作机构的小组形式,以专业性的指导帮助社区案主正视自己的弱势和发展困境,纠正心理和行为偏差,分析自我发展的机遇,拓宽社会交往的范围,完善基层民主组织,通过合法有序的集体行动维护权利,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机会,从而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并逐渐形成影响外部环境和社会决策的社区力量。

事实上,在社区赋权过程中,公民、媒介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是复杂的。随着我国公民社会和社区建设的发展成熟,以社区为中心的赋权逐渐向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的赋权转变,以往社区内部依靠邻里关系形成的组织关系将会更加松散,跨社区、超地域性的赋权行为将会更多展现,社区赋权亟需更有力和更广泛的联结。

我们在继续关注信息获得、意见表达、媒介近用权、个体话语权、媒介素养等媒介赋权的“显见”层面的同时,应拓展研究和实践的更多维度,探寻社区层面的媒介赋权中所蕴含的理性表达秩序、公民政治参与、社会资本占有及分配、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此关注基层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所粘连的交

往模式和权力关系。

(责任编辑:潘佳宝)

###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陈楚洁(2010).公民媒体的构建与使用:传播赋权与公民行动——以台湾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为例.《公共管理学报》,7(4),111-128.
- [Chen,Chujie (2010).Construction and usage of citizen media: communicative empowerment and citizen action: case study on www.PeopPo.org in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7(4), 111-128.]
- 陈树强(2003).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社会学研究》,(5),70-83.
- [Chen,Shuqiang(2003).Empowerment: a new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Sociological Studies*, (5), 70-83]
- 丁未(2009).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国际新闻界》,(10),76-81.
- [Ding,Wei(2010).New media and empowerment: a practical social research.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0),76-81.]
- 范斌(2004).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12),73-78.
- [Fan,Bin(2004).Empowerment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model selection. *Academic Research*, (12),73-78.]
- 韩鸿(2011).参与和赋权:中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影像研究.《国际新闻界》,(6),19-27.
- [Han,Hong(2011).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on the participatory video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rural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6),19-27.]
- 刘素宏,丁艺(2013).议程融合、媒介社区化和自我赋权:公民新闻与社会整合的分析框架.《电子政务》,(7),66-73.
- [Liu,Suhong & Ding,Yi(2013).Agenda fusion, community media and self-empowerment: the analysis frame of citizen media and society integration. *E-Government*, (7),66-73.]
- 李刚存,肖婷(2013).哈尼族村寨的一次微博实验与增权实践.《当代传播》,(6),30-32.
- [Li,Gangcun & Xiao,Ting(2013). An experiment of WeiBo and empowerment practice in a HaNi villag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6),30-32.]
- 马杰伟,周佩霞(2009).视觉社运:艾晓明、卜卫对谈.《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10),197-212.
- [Ma,Jiewei & Zhou,Peixia(2009).Visual social movement: with Ai Xiaoming & Bu Wei. *Communiacation & Society (Hongkong)* ,(10),197-212.]
- 潘晓慧(2013).社区媒体的主动赋权和政府应对策略——以深圳罗湖家园网为例.《今传媒》,(6),136-138.
- [Pan,Xiaohui(2013).The initiative empowerment of community medi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government: case study on www.luohu.com in Shen Zhen. *Today's Mass Media*,

(6),136-138.]

宋晖(2014).社区赋权:当代社区的传播和文化实践.《人文杂志》,(3),108-112.

[Song,Hui(2014).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practice of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ty,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3),108-112.]

孙曼萍(2009).公民新闻2.0:台湾公民新闻与“新农业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9),153-180.

[Sun,Mine-ping (2009).Citizen journalism 2.0: exploring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he reshaping of new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Taiwan. *Communiacation & Society (Hongkong)* ,(9),153-180.]

孙信茹,杨星星(2012).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现代传播》,(3),23-28.

[Sun,Xinru &Yang ,Xingxing(2012).The practice and empowerment of the minority villagers in the mediated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DaYang Pumizu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Modern Communication*, (3),23-28.]

王斌,古俊生(2014).参与、赋权与连结性行动:社区媒介的中国语境和理论意涵.《国际新闻界》,(3),92-108.

[Wang,Bin & Gu,Junsheng(2014).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 and connective actio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medi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3),92-108.]

王锡苓,孙莉,祖昊(2012).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赋权”理论探析,《今传媒》,(4),14-17.

[Wang,Xiling,Sun,Li & Zu,Hao(2012).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in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Today' s Mass Media*, (4),14-17.]

吴炜华,程素琴(2010).视觉赋权与抗逆力的行动实践——剑南“社区媒体行动计划”的反思与展望.《现代传播》,(12),17-20.

[Wu,Weihua & Cheng,Suqin(2010).The action practice of visual empowerment and resilience: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community media action project in Jian Nan. *Modern Communication*, (12),17-20.]

谢进川(2008).试论传播学中的增权研究.《国际新闻界》,(4),33-37.

[Xie,Jinchuan(2008).Empowerment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4),33-37.]

张加春(2012).网络运动:社会运动的网络转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20-126.

[Zhang, Jiachun(2012).Online activism: internet diversion of the social movement.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120-126.]

Boehm,A.& Boehm,E.(2003).Community theaters as a means of 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a case study of women' s community theatre. *Journal of Social Work*,3(3),283-300.

Rappaport, J. (1995).Empowerment meets narrative: listening to stories and creating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3(5),795- 807.